

文革博物馆专集（六十一）

◇ 文艺生命日趋枯萎

毛泽东自执政起，对文化、教育、艺术、新闻等意识形态领域的“专政”就从未中断。在一切舆论工具、新闻媒介都是“党的喉舌”，一切文学文艺作品都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全体文化工作者都要服从党的指令。除非改行，如作家沈从文去搞文物，诗人陈梦家去搞考古，文化人得赶紧学会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保护自己，免于灭顶。

头一件要事是审查旧作。凡旧作中与新社会不合拍的，都得仔细过滤、删掉。为表示与新政权一致，与新社会合拍，宁可“剜却心头肉”。连前中共总书记瞿秋白早年写的访俄游记《饿乡纪程》里的海参威华侨吸鸦片、贩毒等内容，也属“给中国人脸上抹黑”，一九五三年出版《瞿秋白文集》时悉数被删。一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作家要出版旧作，就更得仔细斟酌、删节了。譬如叶圣陶忍痛将他的主要作品《倪焕之》删去了好几章。曹禺则被迫改写《雷雨》、《日出》的剧本，将身为劳动人民的“好人”从阴曹地府拉回人间，使他们的结局由死变为生。

老舍也不例外。一九五〇年从美国归来后，说实在的，共产党待他倒也不薄，给了他许多头衔。他曾先后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联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委。但是时代的大气候使他马上明白，共产党需要的是“遵命文学”，他得赶紧跟上形势。一时拿不出新作，就先对其主要著作《骆驼祥子》开刀。该书末尾有近万字，描写祥子如何堕落为行尸走肉，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他对祥子的结局实际是否定的。可是而今祥子属劳动人民，是无产阶级份子，那样描写祥子有“丑化劳动人民”的嫌疑，再版时只好统统删去。

新作品创作更难。除了按党的指挥棒唱唱时代曲外，其余的动不动就犯忌。在毛泽东的文化专制面前，文学家们都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正如沈从文所说：“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手都呆住了”。巴金自己也说：“我怕开会，却不敢不开……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越是用功，就越是写不出作品来。”⁽¹⁾作家赵树理也写得不多。他自我解嘲地说：“假话我不写，真话不能写，只好不写。”⁽²⁾

老舍也很用功，也写不出什么作品。其实，如他自称的那样，他一直是“歌德派”。⁽³⁾除了歌颂共产党的小作品和为配合政治运动而写的应景文章外，少有作品问世。党要宣传什么，他就歌颂什么。话剧《西望长安》是一个例子。该剧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写成，讲一个骗子如何冒充中共高干，到处行骗。当时那是个大案，在写作过程中，公安部长罗瑞卿曾给过他帮助。话剧《龙须沟》是另一个例子。那是根据北京填平龙须沟、铺成马路的事迹写的，所以末尾写了北京市委书记出席庆祝大会并倡议立记功碑的场面。后来北京市市长兼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以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名义给他发了个“人民艺术家”的奖状。

有那么多光荣头衔在身，就必须时时与党保持一致，积极投入一场场政治运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百万知识分子被打成“极右派”、“右派分子”、“中右分子”，其中包括剧作家吴祖光。老舍与吴祖光是同行，不得不公开发言批判他。自然，这行为不甚光荣。但那是个不仅不许你乱说话，而且不许你不说话的社会。不表态、不打他一杆子，“党组织”会跟他没完没了。而对吴祖光来说，大概多挨几场口诛笔伐也伤不到哪里去罢。

老舍的作家的良心并没泯灭。不久吴祖光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农场，吴妻新凤霞迫于生计，将吴收藏的齐白石的画拿去变卖，恰被老舍买到。见是吴祖光的收藏品，便说等吴从北大荒归来时“物归原主”，可见他在会上、报上发表的斥骂吴的话并非由衷之言。

吴祖光到北大荒劳改时正值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农村中的荒唐事层出不穷，亩产粮食万斤、十万斤地吹。因为说实话的要倒大霉，人们均以沉默对待各种各样的荒唐事，至多只是在亲朋好友之间议论一番。新风霞去河北农村劳动，亲眼见到公社干部们如何指挥社员连夜把几亩地的麦子移到一块田里，点上大灯，开起风扇猛吹（怕密不透风，闷坏麦子），然后向上吹牛说密植带来了丰收。回到城里，她是把老舍当作好友，将此事告诉老舍，老舍忙叮嘱她：“你千万别跟人说呀！”因为密植是毛泽东的号召，他担心新风霞会落个“攻击大跃进”的罪名而坠入地狱。由此可见，老舍骨子里并不是党认可的左派。

由于始于一九五八年的三年大跃进运动彻底失败，三千万人饿死，毛泽东被迫收敛，不那么咄咄逼人，全国的所以政治气氛一度松动，文化方面的专制也有所松动，文学艺术家们觉得松了绑，禁忌少了。一九六〇至六二年全国人民饿了三年肚子，文艺界倒相对繁荣起来。老舍也觉得形势变了，不必再写歌颂党的小作品和应景文章。他开始撰写小说《正红旗下》。该书写的是清朝末年满人的故事，实际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一九六二年三月，文化部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老舍情绪很好，在发言中透露提及他正在写《正红旗下》。回到北京后，他还给一些朋友朗诵过其中的几段。

但好景不长，当年九月间，毛泽东已喘过气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鼓吹“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以此为依据收紧政治套索。他指小说《刘志丹》的作者、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结果全国近万人因此被牵连受害，挨打、关押、逼死，连李建彤在陕北采访时为她带过路的两个老百姓也被定罪而自杀。

以“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的罪名迫害作家，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后来在文革前夕的一九六六年三月上旬，毛泽东说了这么一段话：“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中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4)

毛泽东的所谓“兴无灭资的斗争”，是蛮横的文化独裁的代名词。一九六一年，青年画家徐启雄的工笔人物画《苗寨新嫁娘》曾引起轰动，各报刊竞相转载。一九六四年春，徐却受到批判：“画那么多美女，意欲何为？难道不是想腐蚀革命者的斗志？用这种软绵绵的充满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毒害人民，用心何在？”(5)《人民文学》一九六二年刊登的小说《落霞一青年》受到几位日本文学评论家的赞扬，一九六四年被定为“坏小说”。(6)《北京文艺》一九六二年四月号的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被定为大毒草，“披着历史题材的外衣，向党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7)

全国各报刊杂志都在批判形形色色的“毒草”、“坏戏”、“坏作品”。正在写《正红旗下》的老舍如同头上被浇了一盆冷水。他终于明白，他想写的那种小说不是党需要的。清末满人的故事不合时宜，写出来不能出版是小事，弄不好会惹祸上身。他的心凉了。无奈之中，他搁下笔，把已完成的八万字手稿放进了书桌。他的妻子后来回忆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老舍再也没有动过《正红旗下》，而且，甚至再也没有向谁提起过它来。”(8)

老舍的悲剧更在于他没有决心象沈从文那样封笔，干脆什么都不写。既然身兼北京市文联主席，他的笔还得为党服务。他想跟党走。但越想跟党走，创作生命力越衰竭。他写了一篇快板书《陈各庄上养猪多》，其中几句是“热爱猪，不辞劳……干劲大，不识闲……越进步，越学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这是他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这些文字里已无一丝一毫作家的影子。

在共产党治下的十六年间，老舍的文艺生命日趋萎缩。刚回国不久，老舍曾在公开场合说过“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可是毛主席非但没有给老舍“新的文艺生命”，连他文艺生命的根都刨了。作为一个作家，老舍的生命已经枯萎、死去。

◇ 风暴前夕的绝望

人们读了老舍的那种跟浪潮的顺口溜，只痛其自贱，却不了解老舍本人的伤心之处。平素为人不张扬的老舍只是将内心的悲哀深藏着，从不示人。直到文革爆发前夕才头一次将心中的绝望在友人面前倾诉出来。

那是一九六六年四月间的事。

一九五七年反右后被毛泽东赶走的原人民日报社长邓拓，是中共党内少有的才子。人称“副总书记”的彭真惜才，将他收罗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主管文教。自一九六一年三月起，邓拓在北京晚报开了一个专栏《燕山夜话》，漫谈古今中外。至六二年九月，共发表了一百五十多篇。

老舍很欣赏邓拓的《燕山夜话》，说邓拓“大手笔写小文章，别开生面，别具一格。”⁽⁹⁾四月间，全国大张旗鼓地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老舍心中必定十分悲愤。但他知道，他不能替邓拓说话，他只能沉默。这时，连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觉察形势险恶，赶紧表示对毛效忠。四月十四日，郭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发言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¹⁰⁾毛泽东厚颜，竟亲自批示将郭沫若的发言送报社发表，先后刊登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¹¹⁾

大约就在这时，老舍自己也看出来，他的作家生涯彻底结束了。

四月底的一天，他接到了女演员兼作家王莹的一个电话。

一九四二年，秘密的中共地下党员王莹及其丈夫谢和赓在周恩来指示安排下赴美国留学。王是个杰出的演员，还是个作家。一九四三年春，她曾应美国政府邀请在白宫演出抗战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和抗战歌曲。四十年代末，老舍也在美国，他们是好友。老舍先行归国后，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左派人士受迫害。大概由于共产党员身份被暴露，王莹夫妇于五四年被诬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罪名下狱。后经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 e a r l S . B u c k）等人的声援，王莹夫妇被驱逐出境，五五年底回到中国。一年多后遇上反右运动，谢和赓落网，被打成右派分子，曾被送北大荒劳改了几年。

这时，王莹夫妇住在北京西郊香山。王莹在电话中告诉老舍，她的两本书刚刚修改誊抄完毕。第二天，老舍就专程到香山看望王、谢。在谈话中，老舍感慨地对王莹说：“我自己，在过去十几年中，也吃了不少亏，耽误了不少创作的时间。您是知道的，我在美国曾告诉过您，我已考虑成熟，计划回国后便开始写以北京旧社会为背景的三部历史小说：第一部小说，从八国联军洗劫北京起，写我的家史。第二部小说，写旧社会许多苏州、扬州女子被拐卖到北京来，坠入‘八大胡同’娼妓火坑的种种悲惨结局。第三部小说，写北京王公贵族、遗老遗少在玩蟋蟀斗蛐蛐中，勾心斗角，以及他们欺压压迫下层平民的故事。可惜，这三部已有腹稿的书，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我可对您和谢先生说，这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

欢的小说，以后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说到这里，他情绪激烈，眼泪夺眶而出。王莹也十分激动。两人相对无言，久久不能开口。(12)

这是他们生前的最后一面。四个月老舍走上不归路，王莹和谢和赓不久被捕入狱。谢和赓坐了八年监狱，出来时神经已失常。王莹则更惨，被关进监狱后就再没有活着出来。七四年她死去时，死亡书上没有名字，仅有一个代号“六七四二”。

◇ 迈出最后的一步

五月底邓拓服药自杀。此时老舍虽然对于继续写作已不抱希望，却相信文化大革命不到他头上。当时的革命对象是所谓“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他自觉哪样都不反，哪条都摊不上。七月间见到上海作家巴金时，老舍还很有信心地对他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13)

但是，这一次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谁也躲不过去。老舍在“横扫”之列，人们并不奇怪。但谁也没有料到他会自沉太平湖。自一九二七年昆明湖水吞噬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国学大师王国维以来，老舍是第二位在北京自沉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

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多年来练了不少旧戏，所以现在觉得比旁人更有责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既然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就先将牛鬼蛇神在舞台上穿的戏装先拿出来烧掉。八月二十三日，他们决定在文庙焚烧戏装，顺便将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的“黑帮”装上车。

上车的牛鬼蛇神当中，本没有老舍。不久前，他半夜吐血入医院抢救，刚刚出院，这一天是他出院后第一天上班。他见作家萧军等三十多人被学生装上车，便从人群中站了出去。一位在现场担任指挥的北京大学的女学生一眼认出他来，立即大叫：“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于是老舍也成了他们的俘虏。

到了文庙，几十箱精工绣成的戏装已被堆在空地，一二百学生，主要是座落在绒线胡同里的女八中的学生，一边焚烧京剧戏装，一边挥舞演戏用的刀枪和带铜头的军用皮带，拷打顶着烈日跪在火堆前的“黑帮”。这种带铜头的军用皮带不是商品，当时是干部子弟的特别标志之一。

除老舍外，这些跪成一圈的“黑帮”中还有北京市文化局长赵鼎新、张梦庚、张国础，北京市文联领导干部田兰、江枫，右派分子萧军，京剧名演员荀慧生、白云生等。

这时，成千上万的人拥到文庙，局势完全失控。北京市副市长闻讯赶去，面对大火和狂热的学生，他无法搭救他们。老舍被打得头破血流，有人撕下一块戏装上的白绸水袖替他包扎，且被恩准第一个离开现场。可是回到文联，另一支几百人的红卫兵队伍已经等候在那里。他被抓到文联大门外水泥花坛上示众。

在红卫兵要他手举黑牌低头时，他却昂然扬起了头，并将黑牌愤然朝地下摔去。不料，黑牌碰到了一位红卫兵的身上。于是拳头伴着口号，皮带夹着唾沫，又挨了一顿揍。这时，有人说他是“现行反革命”，应当法办。（据说此人是作家浩然，意图是先将他从红卫兵手里救出，以免不测。）经过一番争夺，老舍被塞进了汽车。

红卫兵的拳头纷纷在车壳和车窗上敲打，尾随而去。在当地派出所里，中学红卫兵们，不少是女八中的女兵，又轮番打他，一直到深夜。临走时命令他第二天早晨拿着“现行反革命”的黑牌，到北京市文联报到。

第二天一早，他对三岁的孙女说了句“和爷爷说再见”，然后就离开家，到了城北的太平湖。

北京有好几个湖，为什么单挑了个城边人稀的太平湖？

老舍生于北京。一岁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老舍的父亲是一名守城的士兵，被侵略军的烧夷弹引起的大火烧死。农家出身、不识字的母亲靠给人家洗衣服、作针线活、当佣人，含辛茹苦养活一家，并咬牙挤出一点钱把老舍送进学校，使他成为舒家门里唯一识字的孩子。一九三二年，老舍为母亲购买了观音庵胡同的一所民居。老母去世之前的十年中，一直住在那里。现在，老舍要回家了。他要到母亲那里去。与观音庵仅隔一道城墙、一条护城河的太平湖是离家最近的地方。

太平湖公园是个自由进出的公园，据看门人回忆，老舍在那里呆了一整天，直到夜里才留下上衣制服、眼镜、钢笔、手杖，走向湖水，把他的绝望化成了行动。

八月二十四日早晨，红卫兵发现老舍竟敢违令，不去北京市文联向他们报到，便拥到老舍住处揪人。他的儿子舒乙闻讯赶回家，见从胡同口到院内、屋内，站满了手提皮带红卫兵。但是没人知道老舍在哪里。舒乙立即报告了国务院。数小时后，周恩来的秘书打电话给老舍夫人说，总理已派人四出寻找他。

这时，老舍应当还活着。但是，没有人想到偏僻的太平湖去找人。直到次日清晨一位演员到太平湖边锻炼身体，发现水中有人，从挂在树上的老舍制服口袋里的工作证，人们才知道大名鼎鼎的作家老舍死了。

北京文联的干部得到这个消息后费了大半天的时间商讨，才决定如何办。他们把舒乙叫去，给他一张公函，上面只有几个字：“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¹⁴⁾凭这张纸，舒乙才能去为自己的父亲收尸，处理后事。

老舍是手握着一卷平素抄录的“毛主席语录”迈出生命的最后一步的。在他的尸体四周的水面上漂浮着陪伴他的，就是他手书的“毛主席最高指示”。

由老舍开始，许多人选择太平湖了结了自己。“短短的一星期内，它竟成为殉难者的圣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这里投湖。”⁽¹⁵⁾

周恩来总理得知老舍的死讯，找到原文化部部长茅盾，要他告诉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妥善安置老舍夫人。王昆仑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央常委，其实是个早在一九三二年就秘密加入了中共的党员，局外人不知道而已。但此时王已自顾不暇，不久便被党揪出，以“特务”、“反革命”的罪名打入监房。所以，老舍遗属再也无人过问。

◇ 中国人的苦难缩影

抗日战争时期，老舍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一九四四年，日寇逼近贵州、眼看要从南边打进四川时，老舍正在战时首都重庆，友人问他若日寇进川作何打算，他从容地回答道：“我哪儿也不去，北面是滔滔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后来，日本人没能进川，老舍也就不必投江自沉，看到了抗战胜利。

谁都料不到，二十二年后老舍在首都以投水自沉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抗战胜利后不久老舍即赴美国，在纽约完成小说《四世同堂》。书中的主角祁天佑（祈天保佑？）是以投湖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所以舒乙后来说：“好像父亲在二十年前就为自己的死设计好了一个模式。”

就在孔庙挨打的前的一个星期天，老舍曾对儿子舒乙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他还将在以前的政治运动中两位文化界人士如何到北京城里什刹海投湖自尽的事告诉了舒乙。在他看来，这也许是最便捷的结束耻辱的办法。

老舍原名舒庆春，十多岁时自己把舒字拆开，以“舍予”作自己的字。所以至今中国的人物志中仍称他“舒舍予”。“舍予”与“舍身”是同义词。重庆おづ约おけ本，沿老舍这条生活轨迹分析，可知他对舍身取义早有思想准备，而且，如果“舍予”，必定是投水自沉，不作他想！

老舍虽是在被红卫兵毒打之后自沉的。但他之所以老舍所以自沉太平湖，不是因为被打怕了，不是因为次日还会挨打，而是因为确信他的作家的生涯彻底结束了。

如果说四月里他流着眼泪对王莹叹息，他从美国归来前计划写的三部历史小说还只是“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的话，到了八月几乎全国所有的作家都成了斗争对象之后，他已毫不怀疑，那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真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钟情北京如老舍者，在这痛心的事实面前，当然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老舍父亲死于庚子年保卫北京之战，骨殖未得保存，在他的衣冠冢里埋葬的仅是他临死前脱下的一双袜子。老舍的遗骨也没有保存下来，他的骨灰盒里仅放了一副眼镜和一支笔。因为老舍之死属“自绝于人民”，骨灰不配被保留，这是当时中国的一条不成文法。

父亲死于世纪初的外患，儿子死于六十年代的内乱，舒氏两代的悲惨结局，正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苦难缩影。在新世纪到来前夕，为文记之。

注 释

- (1)上海《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期，巴金《怀念胡风》。
- (2)《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第165页。
- (3)老舍夫人胡洁青“《老舍剧作选》再版后记”，见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七九年第二期第69页。
- (4)《历史在这里沉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五卷第358页。
- (5)《人物》杂志一九九四年第二期第一七七页。
- (6)《传记文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期第113页。
- (7)《传记文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二期第99页。
- (8)《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第一期第250页。
- (9)《人民新闻家邓拓》（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第59页。
- (10)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
- (11)丁力编《风起雨落几鸿儒》第三二八页。
- (12)《瞭望》周刊一九八四年第39期第40页，王文革中死于监狱，谢和赓的回忆。

(13)巴金《随想录》第二集第十六页。

(14)《历史在这里沉思》（北京：华夏出版社，1986）第三卷第148页。

(15)同上，第149页。

□ z.ding@nr.cc.mn.us

∞ ∞ ∞ ∞ ∞ ∞ ∞ ∞ ∞ ∞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良史的命运

• 王学典 •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是翦伯赞先生三十周年忌辰。据新近出版的《翦伯赞传》披露，翦先生的“绝命辞”写在两张纸条上，分装在左右两个上衣口袋里。辞为：“我实在交不去（出）来 走了这条绝路 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翦伯赞先生自尽前为何三呼“毛主席万岁”，似乎将成为历史之谜。

翦伯赞先生首先是一个“战士”，然后才是一个“学者”。作为一个“战士”，他有着传奇一般的经历，与许多著名政治人物如周恩来、冯玉祥、国民党元老西山会议派主要成员覃振等，都有极深的感情关系，有的甚至是生死之交。在与众多著名政治人物的接触交往中，与毛泽东的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翦伯赞后半生的生死荣辱。

他们相遇于一九四五年的“重庆谈判”期间。在此期间，翦充当了毛泽东、周恩来与国民党高级左派人士如冯玉祥、覃振等人的联系人。翦于此时数见毛泽东，其中重要的两次是在覃为毛举办的两次小型家宴上。据作陪者回忆，在第二次家宴上，“翦伯赞总是要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提高警惕，免遭蒋介石暗算。”（《翦传》40页）不过从后来的一些现象上推断，毛可能对翦的印象并不怎么样。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翦一九四八年底从香港到达河北解放区后，周恩来、刘少奇等先后看望了他，并就他的工作安排发表了意见，毛泽东尽管“知道他已到了”党中央所在地，但并未召见他；而吴晗甫一到达，毛则“亲自接待”，并“特别约谈了一个晚上”，还致函通。对此，可能的解释是：翦是一个自信心极强而又桀骜不驯的性情中人，凡事总有自己的见解，视自己为真理化身者大概不容易一下子接受这种人，这是其一。其二，他们相遇时，一个已是力能倒转乾坤的政治家，另一个则是蜚声大后方的史学家。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毛泽东心目中，史学、哲学、文学……都必须毫无例外地“为政治服务”，所有的这“家”那“家”都必须毫无例外地隶属于当下政治。作为一个“战士”，翦伯赞早就是毛泽东帐下的一个“马前卒”（一九三七年五月成为中共秘密党员，一九六〇年公开党员身份），作为一个“学者”，为真理而献身的信念也早就融流于血脉之中。当“政治”与“科学”还能兼容的时候，翦伯赞并不会感受到角色分裂的痛苦，当“政治”与“科学”分裂之际，翦会在犹疑之余选择“学者”的天职。这样，冲突看来迟早不可避免。当然“进城”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翦亦作过一系列努力，试图被接受。一九五〇年至五一年，翦曾听从范文澜先生的建议，写出并发表了两篇笺释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古代社会”部份的文章，著名的“让步政策”论就出现在这两篇文章中。在写这两篇笺释性史论时，究竟是毛、范（两人私交甚厚）打算借助翦的学术声望，还是翦试图通过范而走近毛，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不得而知。随着此两文的刊出，史学界正式进入了“毛泽东时代”。在整个五十年代，翦亦曾数次与毛泽东交谈，但交往看来并没有改变毛对翦的观感，而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当上层发生“路线分歧”时，他们之间的史学冲突也开始了。

翦对一九五八年“史学革命”的抨击，大概加深了毛对他的不快。一九五八年“史学革命”中发生的一切，无不是高举着毛泽东历史观点的旗帜进行的。如：既然说封建社会的真正动力是农民战争，那末就应该把“帝王家谱”式的历史改写成农民战争史；既然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那就可以写没有帝王将相、改朝换代内容的中国通史；等等。从一九五九年到六二年，翦伯赞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矫正这种“史学革命”的“挂帅人物”，尤其是他的农民“三反三不反”的著名论断对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估价之低与毛恰成反照。这是翦最为开心、最为风光、最为轰轰烈烈的几年。这时的他不仅在史学界，而是在整个学术界、文化界，都是叱吒风云、“一怒而天下惧”的“文化诸侯”。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入木三分、不留情面，是他这时一系列“讨伐”“史学革命”檄文的特点，以致这些文章所刺痛的绝不仅仅是那些小人物。大概从庐山会议开始，毛泽东就把自己与“一九五八年”这个有着特定内涵的年份划上了等号，谁批评“一九五八年”，不管从哪个方面进行批评，都意味着是对他尊严的冒犯。所以，当他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开始以此为据，对“一九五八年”的批评者展开反批评后，翦伯赞和吴晗事实上就已经在劫难逃了。

不过，有材料披露，毛泽东起初还是打算保一下翦伯赞的，只是未坚持到底而已。一九六四年九月下旬，毛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说：“学术批判也要有个界限，不能乱批一气。我看郭沫若、茅盾、范文澜这三个人不准批。此外，再加上一个翦伯赞。”言外之意，写《海瑞罢官》的吴晗则不在保护之列。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名批判吴晗；同年十二月八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推出由康生具体策划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不点名批判翦伯赞。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讲了一番十分著名的话，其中有：“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针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次讲话中，毛表达了他对戚本禹批翦文章的激赏：现在的“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于是，戚本禹点名批翦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很快就在《红旗》上推出。一九六六年三月，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又一次更严厉地提到了翦伯赞：“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当时，批翦的文章已铺天盖地，但仍称翦为“同志”，而吴晗这时已被指为“反共老手”。此番讲话过后，《翦伯赞是怎样积极卖身投靠蒋家王朝的》、《反共知识分子翦伯赞的真面目》之类文字便充斥报刊。翦伯赞终于被架上了祭坛。

中华民族真正的“巨劫奇变”开始了。翦伯赞成为北京大学继陆平、彭佩云之后被揪斗的第三号人物，所受凌辱殴打程度之深，难以言表。毛泽东这时对翦伯赞看得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比任何“反动学术权威”都重。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关于撤工作组的讲话》中，他说：文化革命只能依靠群众，“如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们能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又说：“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陆平有多大斗头？李达有多大斗头？翦伯赞出那么多书，你能斗了他？群众写对联，讲他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你们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还说，“文化革命委员会，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有几个，如翦伯赞，可以被右派用也可以被左派用，是个活字典。”次日，毛又在《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讲话》中提到了翦伯赞：“像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斗，怎么改？学校的事‘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所以要依靠学校内部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康生、江青、陈伯达等利用这些话三赴北大参加万人大会，怂恿揪斗

翦伯赞。在那个疯狂岁月里，有了这些红得发紫者的煽动，翦作为“反共老手”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可以想像。老夫妻俩被赶出居住了十九年的燕东园二十八号，迁至居民区一间小黑屋里，眼看着支持不下去。后来，翦的悲惨处境大概通过一些渠道反映到毛那里去，因此，毛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召开的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那次中央全会上，讲到了翦伯赞和冯友兰，大意是：“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大概还说了要解放翦伯赞、生活上要照顾、给出路、要养起来一类的话。毛的讲话全文以播放录音的形式向全国传达。翦的处境大大改善了，重新搬回燕园居住，还派来一位退休老工人杜师傅帮助照顾生活。据说：翦“非常感激毛主席的救命之恩，连夜给毛主席写了感谢信，由宣传队送中南海。据宣传队负责人传达，毛主席很快即收到了此信，看信后说：翦伯赞的信写的很好嘛！可是数天后，原中央专案审查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突来北大“提审”翦，要他交待刘少奇“勾结”国民党CC派特务“阴谋消灭苏区、消灭红军”的材料。翦拒绝诬陷刘少奇。这样“提审”就一直继续下来，直到十二月十八日。翦可能很难理解：毛主席的话既然“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为什么还要“提审”他？难道连毛主席都“保”不了他了吗？或者背后另有文章？只有到这时，他大概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绝望”。

我敢断定，翦先生在服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制造的强力安眠药“速可眠”前，其心灵所承受的煎熬程度肯定要超过当年的王国维先生。因为他是和夫人戴淑婉同服“速可眠”自尽的。两个人用同一种方式自尽与一个人自尽比，痛苦程度大概不可以道里计。因为在决定自尽前，两人可能得首先讨论是否必须选择死，可能还得讨论是否必须选择一块死，在这时，是否还有翦老反对夫人同死而夫人坚持同死的争执？这是怎样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场面！要知道这不是讨论人间的其他问题，这是讨论剥夺自己生命的问题。而且要知道翦早就流露过“他怕想到死的时刻的痛苦”这种对“死”的恐惧心理。侯外庐先生说：我记得，他将近五十岁的时候，还向我披露小孩一样天真的心里话。他说，他怕天黑以后的寂寞，他怕想到死的时刻的痛苦。然而，我的这位老朋友，他在世的最后日子，却被黑暗，被寂寞重压着，过份沉重的压迫着，以至于觉得生不如死……

事后人们看到：“翦氏夫妇服装整齐地各躺在自己的床上，已安详地离世。”翦先生是在他最不愿看到的结局中了却一生的。

侯老还说：翦“既是严谨的学者，也是出色的鼓动家；既是勇敢的革命斗士，也热爱生活，天真有如赤子”。而且侯强调，“了解翦伯赞性格中还有天真一面的人”为数不多。如同许多人所看到的，一个“天真有如赤子”、“喜怒哀乐皆形于色”的人，往往也是一个极度脆弱的人，所谓“高高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是也。

但脆弱与宁折不弯，天真与刚直不阿往往又互为表里。翦老性格中天真脆弱的一面之所以鲜为人知，那是因为被他性格中熠熠生辉的另一面遮掩住了。翦的刚直、风节、一条道走到黑的执著，在中国学界是出了名的。刚性太强，韧性乏绝，当重压超出承受力之外时，由脆而碎当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笔者曾经说过：翦伯赞留给史学界的最珍贵遗产莫过于他的“良史人格”。唯真是从，正气浩然，是这种人格的特征。而且，此种人格其来久矣。四十年代，面对蒋介石的刀丛箭簇，翦曾愤言：“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文革”前夕，当他素所倡导的历史主义被指控为“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时候，他则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在真理的问题上，不能让步。”当点名批翦的文章“黑云压城城欲摧”时，他自信地表示：“我要等着看到批判我的最后一篇文章。”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刊出后，翦不顾自己处境的险恶，面对《文汇报》记者，怒不可遏，仗义执言：

“姚文元的文章非常粗暴，这是抓辫子，打棍子，给吴晗同志扣政治帽子。如果这样整吴晗，所有的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当一些人声称“解决刘少奇三五、三六年的问题，翦伯赞是关键”而向他勒取口供时，他直言：“我不知道的事，不能随便乱写。”最后他看出，摆在面前的似乎只有两条路：要么死要么屈节。对于一个具有他这种气质、人格与信念的人来说，在二者之间选择什么，已是不言而喻的了。“墙倒众人推”。我不知道在所谓“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公诸于天下之后，除翦伯赞外还有几人能够拒绝落井下石。而且今天看来，翦即使落井下石胡乱编造一通苟活下来，历史也会原谅他，就像历史已经原谅了那么多一样。

翦伯赞的死，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人的轻生。翦伯赞大概是中国最后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良史”，他的死可能意味着历时数千年历史学家要为记录历史真实而殉职那样一个漫长岁月的终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可能在真实的历史中，“假回邪以窃位”，“持谄媚以偷荣”的史官太多了，以致使许多人把历史看作那些有权有势有钱的人随时都可以奸污的“婊子”，所以，“齐太史”的故事传颂不绝。这个故事广为人知，但其意义却乏人深究。宫廷政治、皇权制度的黑幕性必然导致历史纪录的大面积失实。良史的可贵在于：他虽然不能根本改变这种历史记载上的体制性失实的状况，但他们的人格却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体制缺陷的惟一可供凭借的资源。尤其重要的是，偶尔出现的“良史”们以血作墨，把“据事直书”这个历史撰写的最高法则记录下来。“齐太史”的故事之所以值得珍视，就在于它传递了一种精神薪火，凸现了一种史家的执著追求。

翦伯赞之死的另一意义可能是再一次向世人提出了良史的命运问题。“历史”赖良史以存，而良史在历史上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翦伯赞对这种命运深有体悟，在谈到刘知几时，他悲从中来：“吾人读刘知几书。而知其才、学、识三者而并有之。惜乎！任道其职而道不行，见用于时而志不遂，郁快孤愤，终至贬死。贤者委弃，千古同叹，又岂独刘知几为然耶？”谁人又能想到翦伯赞当年对刘知几命运的慨叹竟成了他自己同样命运的谶言！也许，这就是历史的残酷！

良史在历史上的悲剧命运看来根源于“史官”与“史家”双重角色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体制内的“史官”，他要服从政治权威的支配，接受体制的严厉约束，在划定的圈圈里活动，是非不能“谬于圣人”。作为“史家”，他必须坚持“直笔”，遵守“史法”“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不虚美，不隐恶”，“如实直书”，直面历史真实。在有些情况下，“史官”与“史家”并不存在东风与西风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体制内的“史官”也可以保证史书在一定程度上的“实录”性质。但这必须具有一个前提，当政的必须是一个“良大夫”。翦伯赞是北大历史系主任，おそ根坎任何一个大学的历史系主任都是“九品芝麻官”，可是要知道，一九五二年后的北大历史系是原清华、燕京、北大三大历史系调整合并而成。掌握了这个新历史系，就等于控制了旧中国的主流史学。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显赫的“史官”位置。翦在起初似乎也安于这个“史官”之位。但到一九五八年后，他原本固有的“史家”气质不断显露出来，“史官”的体制属性与“史家”的民间气质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最后在是否为“中央专案组”提供证词的问题上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以致于使他不得不死。侯外庐说：翦伯赞是我们这个时代“德才学识四者兼备的良史”。翦伯赞用自己的死证明了自己的最终归属：他和历史上所有的“良史”一样，归根结底是“史家”而非“史官”。

□ 节选自《读书》1998年12期

~~~~~

【自由论坛】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我看电视片“老三届”

• 老 牛 •

文化革命和我们那几届中学生大规模上山下乡过去三十多年了。那些不愿再去想，却又每天环绕在心中的东西还在不时进入脑中。刚刚看过国内拍的电视片“老三届”录像带，觉得我这些东西不写出来心里总是欠了什么。而且，现在不写，恐怕以后就写不出来，或者环境不再允许我写了。写出这些并非要表明我的想法比较正确，我只想让人们知道这也是一种看法，哪怕有人认为这是错误或可笑的。亦或写的这些可以让人了解那个时代的一个人在当时怎样看问题，带着那时的烙印又是怎样看后来的一些事的。

(一)

和所有老三届的同学一样，我与共和国同龄生长。说我们生长在毛泽东时代再准确不过了。从小学到中学，从记事开始的反右到三年困难时期，我心中的理想——共产主义越来越坚定。我努力学习，积极参加校内外的各种社会活动。当我做得不够好时，从来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大跃进时，我为自己年龄太小，无缘参加彻夜炼钢而遗憾。但我还是在允许的范围内做好我能做的每一件事：积肥，捡废铁，种树……我为密云水库工地的人海激动，为1070钢产量翻番热血沸腾。我也为次年钢产指标从1840万吨修订降下来而遗憾。我相信人民日报说的：尽管我国遭受百年不遇的天灾和苏联的背信弃义，我们党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没有让一个人饿死。我和绝大多数人一起，无怨无悔地和党中央、毛主席一起承受帝修反给我们造成的暂时困难。那最困难的三、四年里，给我的记忆不仅仅是饿肚子，更多的是认真的思想改造。那一次次退回的入团申请书，固然给我带来一丝丝的委屈，却决谈不上“屈辱”二字。我丝毫不怀疑我的“非劳动人民”家庭带给我的落后思想。我讨厌父亲每天的唉声叹气。我为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描绘的宏伟蓝图而振奋，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度过60，61，62年的黑暗，迎接63，64年的春天。班里同学什么家庭出身的都有，我从没想到谁比谁高一等。我羡慕工农子弟的朴素阶级感情，羡慕高干高军子女的高尚革命情操和水平。

我并不恨自己的出身，班上一个高干出身的同学就对我说过：“其实我很羡慕你们出身不太好的人。你们出身不好，因此不断努力改造自己，检讨自己。这方面进步其实比我们要快。”很难想像我当时的激动心情。除了加倍努力之外，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报答党的养育之情和同学们的帮助、信任呢？尽管现在看来这些真够滑稽和荒诞的，但那一幕幕往事却象发生在昨天一样。

现在的年青人看电视片“老三届”，恐怕很难理解“老三届失去的是理想”指的是什么。他们会认为那是才智充份发展、事业有成这些如今看来正常的东西。然而，按那时的讲法，这要读作“出人头地，成名成家”或曰“白专”，是与我们要成就的事业格格不入的。不要笑，至少当时我就一点也不怀疑这绝对是正确的。即使是掌握一技之长，有安身立命之本这种想法也很难和“理想”这个高尚的词放到一起。在我青少年时期的人生观是这样的：人活着就必须要为人类做出贡献，或者物质的，或者精神的（不怕你笑话，我至今不放弃这一观念）。人类发展的最佳终点已被伟大革命导师们指出了，那就是共产主义。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唯一的路就是跟党走，听毛主席的话，放弃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因为共产主义事业是如此艰巨伟大的事业，一定要全体人民放弃自我，万众一心地在伟人领导下才能完成。当时我一点也不怀疑报上，书中及社会种种媒体教育我们的：全国人民都是这样做的。也就是说，包括所有工农商学兵。毫无疑问，更包括所有革命老前辈及他们的革命后代们。也许曾经持有这种观点就是我们被称之为“吃狼奶长大的一代”及被人讥笑、看不起的原因吧。

(二)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一系列社会现象在我心中撕开第一道裂痕。如今社会上不少人认为，文革开始时如同党卫军一般冲入社会打砸抢，凭着先人一步得来的小道消息翻云覆雨的那些人，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老三届”。实际上这并非正确。我们只能说那些人是在老三届这个年龄层中的。虽然后来大多数那个年龄层的城镇青少年都入了红卫兵，但那只能算是“全民”红卫兵，和“伟大领袖”当初借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已完全不同了。正宗的“老红卫兵”虽是一个群体，但更是一个阶级。尽管历史上有时叫别的名字（如“八旗子弟”）或根本没名字，它的确是一个已存在了几千年，而且现在还存在的阶级。在这个群体中，尽管有不同的观点和政治派别，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贵族。他们有权向他们的老师同学挥鞭皮带，他们有权打砸抢，有权杀人不偿命，有权以权谋私、将人民创造的财富划为己有……一次，我所在的中学所有师生被集合到操场上开会。一个高干子弟在台上说了真话：“什么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在劳改营里也团结百之九十五？”得到他的战友们的一片喝彩之后，粗大的鞭炮被一连串扔到台下几百师生群中爆炸。看到人们惊吓得左右躲闪，“子弟”们十分满足，又唱起“长征组歌”。喧闹声中，一个声音从台上传来：“他妈的，这歌也是你们可以唱的？”声音没从扩音器传出，但对我来说，这比打雷声还大一——“怎么会是这样的？希望这是一时的昏话，至少希望这是个别的现象。”这是我的理想受到的第一次打击。事情本身引起的似乎是一种个人的怨恨，但它背后告诉我的远远不只是个人的恩怨。当周恩来总理在人大大会堂宣布我国石油自给，宣布我国试验成功第一颗原子弹时，当我们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时，我从没想到，我们中很大一部份人并非当然地有权在“我们”之中。相当一部份人只能具备仆以主为贵，拍手喝彩的资格。江山是高干子女的父兄打下来的，这些成果理所当然地属于他们的。在而后的年代中，我的种种经历、体验、所见所闻将从那些日子开始产生的这些认识一步步建立起来。

68年底，我和全国大多数知青一样，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城市，到穷困的农村插队落户。这时的我已不象两三年前那么天真了，但内心深处对理想的破灭仍不甘心。记得在火车站给我们送行时，一个邻居夥伴的老父亲认真地说：“不会这么简单的，毛主席一定有他的安排的。一两年后打完核战争，你们就是国家恢复重建的主力。”我当然不信这种小市民式的俗谈，但又不愿承认那些从实际得出的更合乎逻辑的推断是事实。在农村和工厂的九年中，我拼命地劳动，不甘人后。我从农民、工人身上、从社会学到了很多、很多。但那些东西都不是毛泽东希望我们学到的。简言之，我的理想在这九年劳动中完全破灭了。具体地说，我的世界观基本上变成今天这样：随你怎么说得天花乱坠，反正在我这儿是没有共产主义了。我这一辈子能做的事，就只能看看有没有为人类的物质进步尽力的机会了。

插队四年后，我赶上了末班车，离开农村到了工厂。在工厂里我努力工作，自学专业知识。厂里的老大学毕业生和我关系都很好。当然，我很想上大学。当时厂里不少人说只要有一个大学名额，就非我莫属。年年推荐大学生时，领导都热情地对我说：“报吧，你不报谁能报。”可年年的结果都是以我在被子里偷偷哭一场而告结束。我渐渐明白了，我对推荐上大学可以做的最令人满意的事，就是年年报名让那些一门心思谋私利、保官位的干部们心安理得。毛泽东死后第二年，我得以再次赶上末班车，考上一所重点大学。我的一个梦想实现了。我必须努力学习，不为在我心中已远去的“共产主义”，不为那个属于“元勋”和“红后代”的政府，只为有可能为人类多做点贡献。我心知年龄已大，无法与年轻同学争短长。我早有心理准备：即使学得一塌糊涂，也要全力以付不放弃。

毕业后我考上一所重点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读得很苦，但在苦苦挣扎中，一次次我都过来了。事事在我这儿都比别人费劲儿，幸运的是，我总能走到最后一步将它完成。不管怎么说，我是挣出来了。我基本上实现了我后来的理想，对人类物质文明发展做出了一些贡献。人的社会贡献有相对和绝对两种。我的绝对贡献是不大

的。青年时教育中断、本身资质不高是原因，自学中养成的一些业余习气也影响了。我后来的工作能力。但就我个人的自身能力而言，我这一辈子大体上是问心无愧了。我们的儿女们会觉得我们活得太累。也许吧。也许人人都像我们这样活法，生活确实会太单调、太灰暗。从这点看，老三届的确不能作后来人的榜样。但从我们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那天起，正常的路也就不属于我们了。

### （三）

若有人问我，文化革命和后来的经历告诉了我什么。我想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说，贵族们用他们文化革命中及其前后的行为告诉我：“这个天下是我们或我们的父兄打下来的，我们是当然的享受者和继承者。共产党做得好，你们有义务为我们鼓掌。我们有什么做得不好，看到了我们自己知道该怎么做，用不着不相干的人说三道四。”至少我见到的事实就是这样的。忘记了这一点，一个人在中国就活得很累，即使不是自找麻烦那也是自寻烦恼。其实，这一观念在中学时父母、老师就在各种场合给我们讲过：“别那么天真啦，人家那是客气，你们以为真的让你们提意见哪！”对我们的父辈而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新场面。而对我们这一代，那却是天经地义的真理。自然，那时父母和老师的这些话是很难进入耳中的。在农村，农民也和我们讲过：“你听我说：什么叫‘百姓’？‘百姓’就是一百个姓，谁坐上龙椅就姓谁的姓。”就象秋菊说的：“村长嘛，打人就打了呗。”多么坦然。当然，让我彻底接受这一点的不是父母、老师和工农的某一次言教，而是自己的社会经历。

文化革命中高干子女们居高临下傲慢地向人们宣称中国的今天和明天只属于他们。他们说对了，那时和后来的中国和历史上的数十个封建王朝一样，只属于打下江山的那一些人及他们的后代们（当然不简单地限于嫡系传人）。若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们宣称自己不是封建王朝，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仅此而已。老三届的悲哀也就在他们自幼到青年时代一直沉浸在“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和“我们献身这壮丽的事业，无限幸福无上荣光”的美梦中。一旦这些美梦被它们的制造者的行为（那些骂狗崽子的高干后代们也长大、当官儿，变得成熟了，再也不容易从他们口中听到“天机”了）戳破时，他们内心的伤痛是难以抚平的。

然而我们这一代与老一代人又不同。象彭德怀那样的老革命将毕生精力献给了他们的理想，在将不久于人世时，发现自己从事的不过是又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而已。他们连死的心都有。当然，他们中相当多数也为他们的子女能因他们手中的权力而占尽人民的便宜满意地离开人世。我们则不同，我们心虽死，但还没有为理想的破灭而去身死的念头。我们还有一半时间从思想到行动转这个弯子。同样因为我们还有一半人生要过，我们不能耽误。由于失去了受教育的黄金年华，剩下的一半已与正常发展不能相比了。但是，历史不会再给我们另一次机会了。我们没有时间抱怨这个，后悔那个。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抓紧每一小时工作，为人类进步和发展做尽可能多的事。或倾尽心血，培养我们的下一代，将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文革以后许多运动（或说“污染”，“动乱”），老三届不少人都持有鲜明的政治观点，但他们中全身心投入其中的却不多，有人将其归结为老三届的弱点。也许吧，但也有可以理解的一面。如果了解这一点，多少也可算是对老三届有几分理解了。

说穿了，这个理想的破灭其实也没什么。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创造了一堆规律。骗了他们自己，也骗了我们这一代人。马列主义不可能把他们从的封建主义道路上拉到一条不存在的路上去。少数正直之士严以律己的行为扭转不了总的趋势。对现在社会上盛行的腐败之风和“太子”们肆无忌惮的掠夺行径，人们虽然恨之入骨，却也见怪不怪。如果我们从小就被共产党敲着脑袋告知，皇帝轮流坐，今年到他们家，在现实面前我们心理上会比实际上容易接受得多：那没什么，五千年改朝换代的历史发展不都是这样的吗？



老三届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代人。历史已快跨越我们这一代了。若没有文化革命，我们是普通的一代人。如果说老三届有什么特点，我看不能仅用插队来概括。不错，上山下乡是我们人生中极其重要的一环。然而现在再让中学生上山下乡，无论如何他们也产生不出老三届的道德标准和人生观。老三届实际上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同时又是毛泽东思想在他们心中死去的一代。近年人们对老三届在社会中的表现基本上是肯定的。在历史即将跨越老三届时，我们还能在以前没有想到的方面对社会起一定有益的作用，心里总是高兴的。

我在家里没事时常常唱文革前的革命歌曲，儿女们很不理解：“爸，你那么讨厌那个年代和那个政府，干嘛还老唱那时候的歌呢？”唉，谁让咱是老三届呢。

□ 寄自美国

∞ ∞ ∞ ∞ ∞ ∞ ∞ ∞ ∞ ∞ [back to TOC](#)

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之必然  
おぜ娼鵯斡酪阉壬的问题

• 周泉纓 •

随着历史的推移和当事人伤感的淡化，震惊中外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开始全面显露出来。因此，我认为对文革进行正确和客观评价的时候，或许已经来临了。

到目前为止，海内外对文革的看法或评论，原则上有三种。第一种看法，是文革当中占主导地位的看法，认为文革是无产阶级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的实践，是中国甚至世界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的尝试。第二种看法，是大陆现在占主导地位的看法，认为文革是一场乱国乱党的人为的悲剧性的大失误，其主要责任在毛泽东个人，而不在整体的共产党。第三种看法，是在海内外相当流行的看法，其中最急烈表达方式要算香港某家杂志在今年八月的有关评说了：大跃进饿死三千万农民，文革两百万人含恨以终，文革的遗患不可估量，毛泽东死有余辜。

对于上述三种对文革的看法，到底那一种是客观正确的呢？显然这个问题涉及人的认识的真理性问题。本文下面要讲的对文革的看法，综合和扬弃了上述三种看法，所以本文的看法是上面三种看法中的任何一种看法都无法包容的。

◇ 共运是资本原始积累之必然

文革是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发动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事件，因此文革是国际共运的当然的一个组成部份，这是文革最基本的历史事实。由此可见，要研究文革首先必须把握国际共运的历史根源和基本内涵。

国际共运是资本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必然的产物，是无产阶级和知识阶级联合起来对资产阶级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历史性的回报，是社会规律纠正年青的资产阶级过急过火地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失误的历史工具。

◇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的误区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的一种误区，有关的民族在民族独立过程中一旦走进这种误区，就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闯出这种误区。从建国开始到改革开放为止

的中国历史，就是中华民族以伟大的探索精神和高昂的历史代价冲破马克思主义误区的痛苦历史。

首先是大跃进的大失败。大跃进的失败，从理论上讲是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的失败。从实践上讲，大跃进的失败是包括工人在内的劳动阶级的运动的失败。

其次是人民公社的失败。人民公社的失败意味着广大农民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理论。这次失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产关系问题上的乌托邦之实质。

最后一次失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大失败。文革的失败全面系统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另一大基本的法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真理性。

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分析，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三次失败是国际共运在中国的全面的系统的失败。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分别在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里全面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同时，这三次失败也雄辩地证明了，无论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或者是知识分子都不可能成为成功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级力量，可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社会的设计思想，是一种不可能有实际阶级依托的乌托邦式的空想理论。最后，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三次失败，国际共运的历史惯性终于被用尽耗竭，从此国际共运基本上退出人类历史的舞台。所以，文革作为国际共运在中国的三次失败中的最后一次失败，当然是国际共运全面失败之必然，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最终必然会冲出马克思主义这个历史误区之必然。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三次失败的实践中，刘少奇和彭德怀等共产党人，代表了党内尊重社会规律的自在的倾向，他们原则上主张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既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出发去建设中国社会；毛泽东则代表了国际共运巨大的历史惯性，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基本上是从既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出发，去解析和重建中国社会，所以毛泽东的路线是彻底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路线，是将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进行到底的路线。

毛泽东的路线虽然是错误的，但由于他的错误路线代表了巨大的历史惯性，又有他的前人的强大的理论逻辑在支持，所以至少在当时，毛的路线在理论上是没有任何认真的敌手的。更重要的是，当毛的路线在实践中出现严重问题时，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在内的全体共产党人，谁也在理论上搞不清楚其中的根由，因为他们谁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怀疑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真理性。于是历史就出现这么一种人类在实践中经常出现的两难处境：一方面，现实证明自己所坚持的路线已经出现某些问题，这说明继续坚持这种路线存在着某种盲目性，因此可能风险很大；另一方面，无论是客观的敌对方面，还是自己头脑中的主观敌对思路，都无法证明自己坚持的路线在战略上是真正错误的路线，而且除了这条路线之外又不存在其它的新路线可供选择。事实上毛自己晚年关于“自信又不自信”的自白，就是他陷入这种两难处境的生动的写照。至此，我想冒昧地向所有的文革评论家们提出一些问题：如果您处在当年中国的毛泽东的位置，您将怎样去摆布您和您的民族的前途？而在上述两难处境下，毛泽东用他的“砸得粉碎物质仍然不灭”的英雄气概，选择了将自己的错误路线进行到底的历史前途，您说他到底又错在哪里？人类只有依靠伟大的探索精神才能在宇宙中生存和发展的人类，依据什么去指责“毛泽东死有余辜”呢？如果我们人类永远陷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相互敌视和残杀的冤缘报应的怪圈中，又怎么去迎接人类共同发展的光辉未来呢？

◇ 文革是马克思主义之必然



如果讲文革是一种历史错误，那么它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错误的必然；如果说文革是历史性的试错实验，那么马克思主义是文革这种历史性的试错实验的设计思想；最后如果有人硬要说文革是一场浩劫，那么这场浩劫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之历史必然。所以，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的固有逻辑，纯粹地将文革的主要责任归于毛泽东个人，这种错误的历史评论对人类之未来是没有指导意义的，同时对参与文革的近十亿中国人民也是不公正的。

文革是上层建筑领域内的国际共运。文革的目标是解决共产党干部的和平演变问题，即解决资本主义当权派问题。关于走资派的提法很多人都不以为然，甚至到今天连共产党自己对走资派的提法也不认账，我认为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事。铁的历史事实证明，如果讲走资派的提法，在文革中是一种天才的正确的提法，那么今天则是普遍正确的提法，试问当今的中共当权派有多少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据我所知，当年在文革当中，红卫兵原则上都非常清楚走资派是客观存在的，走资派有三大特征：第一是他们在经济上他们支持包产到户；第二是他们在政治上维护干部的某种特权；第三是他们毫不留情地镇压动摇他们的权力地位的造反派。关于这三大特征，我们从刘少奇、邓小平的历史表现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毛泽东发动文革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的无产阶级而言是天经地义的。由此可见文革的要害问题根本不是走资派是否存在问题，文革的要害问题是打倒走资派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问题。而在文革的要害问题上，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彻底错了、毛泽东路线彻底错了、文革当然也彻底错了。

毛泽东当年关于走资派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情相结合是产物。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社会的基本阶级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而且还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加计划经济必然使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所以，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问题和党内的走资派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完全是社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问题。既然是反作用问题，它在时间上就不可能是持久的，在作用强度上是有限和可以克服的。换言之，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是不受历史欢迎的制度，因此走资派是不受人民劳动大众欢迎的。所以，毛认定走资派可以用七八年搞一次文革的办法，不断地一批批地打倒他们，这样走资派会越来越少，社会上资本主义倾向会越来越弱，即便在某种特殊条件下，走资派现象出现暂时的反弹，只要共产党自觉坚持毛的路线，走资派问题终归会解决。

然而，文革发动后失控和半失控的国内局面，使毛泽东自己对自己发动文革的理论发生了动摇。毛在文革后期有过“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讲话，从这个讲话中人们可以明确无误地体会到，毛当时已经发现红卫兵大字报，比如《四一四思潮必胜》所揭示的严重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已经证明，文革培养的极左派，在获取特权和对待群众等问题上，比已经打倒的走资派还不如，此外造反派一掌权就把自己的既得利益放在首位，完全实用主义地对待毛的任何的指示，更不必讲叫他们牺牲自己局部利益去为所谓解放全人类的目标去奋斗了。这意味着如果将文革路线坚持下去，只能使被打倒的走资派越来越多，从而狗崽子也越来越多，最后共产党势必会在文革之路上自杀身亡。更严重的问题是，无论是毛泽东自己还是红卫兵，当时都在理论上搞不清楚这个问题的根源，因为当时他们当中谁也没有从体制外去思考文革问题，即都没有从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的方向上去思考文革问题。我的美国朋友宋永毅先生在他写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一书中讲，《四一四思潮必胜》是文革中唯一被毛点名批判而没有真正批判的红卫兵大字报。这说明宋先生在发掘文革史资料的要点方面的敏锐力是很高的，但是宋先生没有发现《四一四思潮必胜》所提出的问题，正是毛泽东和他的红卫兵精英们都已经发现，但都百思不得其解的关系着文革的前途和命运的根本问题。

因此，文革中所提出的走资派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

用问题，而是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正作用问题。这种来自经济基础方向的正作用，原则上是上层建筑不可抗拒的。因此，即便在文革这样残酷的条件下，在当时社会经济可能的增长点，新生的走资派也在顽强地不可扼制地生长出来。比如，当时某些农村的包产到户就是在那里土生土长的走资派领头搞起来的。又比如，当时在温州这样的天高皇帝远的海边城市，出现大面积的资本主义私营经济，也是在新生的走资派的支持下搞起来的。至于在政治上，文革所培养的造反派，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至少原则上也都不是无产阶级当权派的后备队。这一点中国的新老知识分子原则上都全力支持南巡后的邓小平的事实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文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对付走资派，从本质上讲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因此文革也只能适得其反。关于这一点文革的直接后果是最雄辩的证据：在文革中红卫兵客观上搅乱了共产党的天下，打掉了共产党的威势，全面动摇了共产党的信仰，从而逼迫邓小平率领共产党彻底退出无产阶级事业的狭隘的舞台。

由此可见，前面已经提起过的，关于无产阶级实用主义的右派对文革的看法或观点，其前半观点，即认为文革是乱国乱党的大悲剧，无疑是有真理性的，因为事实上文革前中国共产党的江山是相当稳固的，如果没有文革的大折腾，中国现在也不会比北朝鲜弱。但是，其后半观点，即认为文革失误主要责任在毛个人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从实际上观察，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文革理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必然，文革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中国贯彻到底的必然。因此退一万步讲，纵然没有文革，中国的无产阶级的江山也必然要灭亡，而且灭亡的方式，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可能比文革导致的结果更惨，罗马尼亚演变和苏联解体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 ◇ 文革是知识阶级崛起之必然

文革还有一个人所共知的问题，那就是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中国年青一代知识分子为依靠力量去发动文革，这无疑也是国际共运的新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知识分子只是一个社会阶层或一些社会分子，知识分子只能依附在别的阶级身上才能在社会中生存。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知识分子总体上是可以改造和培养的，无产阶级政权完全可以也应该培养出自己的知识分子来为自己的事业服务。

因此，当五七年大鸣大放失控之后，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认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是共产党自己培养的，所以他们才与共产党不一条心。于是共产党也就毫不手软地通过反右斗争，将这批知识分子打入了另册。这样建国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梯队就历史地形成了。

到了文革，毛泽东还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有关知识分子的理论，认为建国后共产党培养的年青一代知识分子应该是能够依靠的了。同时，由于建国后共产党依靠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劳动大众进行大跃进也失败了，依靠农民阶级搞人民公社也失败了，现在共产党依靠自己培养的年青的知识分子来进行文革尝试也是一种没有余地的选择。然而事实大大地出乎毛泽东之料，知识分子这些“毛”独立性大得很，他们根本不可能按照毛泽东的意志，顺从地附在无产阶级这张“皮”上，结果使文革运动始终是在失控或半失控中进行，从而给共产党的事业带来了空前的风险。邓小平上台之后，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他无法重复反右斗争的做法，但他毫不迟疑地提出和推行“抓三种人”政策，实际上是将文革两派知识分子一个不漏地用无产阶级政治审查的铁筛子筛了一遍。这样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二梯队又历史地形成了。

最后是六四运动。由于文革彻底耗尽了共产党的运势，邓小平这位注重实际的明智的共产党领袖不得不选择历史的必由之路，率领中国共产党主动自觉地进行和

平演变。当然，邓小平的伟大壮举也是中华民族决不放弃百年不遇的复兴机遇的意志的反映。结果，邓的历史性的选择，受到党内正统马克思主义势力拼死的阻抗。在这种本就预料之中的事情面前，邓小平相比知识阶级本性没有改造好的理想主义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显得缺乏理论上的彻底性和坚定性。于是，老百姓中口碑最佳的共产党领导人胡耀邦，成了邓向党内正统派妥协的牺牲品，接着乘胡之危上台的赵紫阳也出现了同样的政治危机。在这个历史的新的紧要关头，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前两个梯队还沉沦在文革的历史冤恨中无法自拔，结果中国知识分子最年青的第三梯队，孤军被历史推上了六四的历史舞台，而他们一登场就自发地暴露出知识阶级独立性的“狐狸尾巴”，从而一下子吓坏了邓小平，逼得他犯了他最可能犯的那种几乎断送他晚年的历史机遇的重大错误。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三梯队亮相的情况。

所以，在建国以来每个历史的重要关头，知识分子三个梯队分别相继与共产党交手，结果无论是建国前留下来的老知识分子，还是建国后培养的新知识分子，都被迫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在建国后始终也摆脱不了挨整受压的处境。对于这种历史现象，长期以来共产党和知识分子双方都搞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恍然大悟，原来知识分子并不象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是一个必须依附于其它阶级的阶层或社会分子，知识分子自从阶级产生以来就是相对于劳动阶级和财产阶级独立的阶级，它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同时它也是其它两个阶级不可替代的。只不过在社会生产还没有高度发展之前，知识阶级的力量相对较弱，因此其独立性一直未被人们所认识，这也是按财产多少划分阶级的错误方法得以广泛应用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主义这种两极冷战时期的过渡性的不稳定社会里，当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被铲除之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就自然上升到主要地位来了，而被打倒而不可能被打死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意志也只能通过知识分子来表现了。于是，虽然共产党和知识分子双方都不意识到知识分子是独立的阶级，但社会规律不饶人：社会规律迫使共产党情不自禁地一次又一次地把知识分子的三个梯队全部推到自己的对立面上去；同时，社会规律也会迫使知识分子在每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情不自禁地要表现自己的阶级本性。所以，建国后中国社会主要是阶级矛盾，事实上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无产阶级与知识阶级的矛盾。

知识阶级独立地位的揭示，使我们对文革的认识大大地深化。我们透过文革的种种现象，不难看出文革事实上中国现代知识阶级开始崛起之必然。

第一，从中国社会的实际考察，在文革发动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事实上已经成为科技战线和工业战线举足轻重的力量，尤其在中国自制出原子弹之后；在农业战线，虽然种田主要还在依靠农民的体力，但科学种田的口号也已经提出来了。所以知识分子在文革中被选为依靠力量，在阶级实力方面也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文革的事实也证明，中国知识分子在任何人不得动用枪杆子的大前提下，已经能够大闹天宫和大乱天下了。所以，在知识分子拥有如此阶级实力的前提下，毛泽东选择知识分子为依靠对象发动文革，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正如前面所讲的，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理论来看，毛泽东依靠共产党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搞文革，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同时，也正如前面已经讲的，在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失败之后，共产党选择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为依靠对象，也是国际共运没有余地的选择。此外，从毛泽东的政治素质讲，知识分子被选为文革的依靠力量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文革前毛泽东被神化为人民的大救星，文革后毛又被某些人描述成为用无边的神通指挥中国十亿阿斗唱文革大戏的神。其实，毛泽东与我们一样是一个凡人而不是神。我认为，毛泽东与马克思、列宁这两个重量级的共产党领袖一样，是一位知识阶级本性没有改造好的共产党领袖，因此他与知识分子的渊源是很深的。事实上五七年知识

分子的大鸣大放就是毛亲自发动并企图利用它来制约干部的一场运动，后来因为运动迅速失控，毛才改变了初衷，结果让邓小平这位类似斯大林一样的知识阶级本性改造得相当彻底的共产党领袖，充当了一次镇压知识分子运动的急先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是五七年毛与知识分子缘份的继续，而这种缘份在斯大林和邓小平身上是找不到的。所以，这种缘份存在的本身就内含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它意味着知识阶级事实上是我们民族走出马克思主义误区、两大阶级结束相互残杀的历史和人类告别两极冷战的主导力量。同时，这种缘份的存在，也显示了知识阶级在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的特殊的方式方法，这种方式方法就是占领人的灵魂阵地的和平演变的方式方法，这是一种任何阶级在战略上无法抵挡的方式方法。

第二，在文革中，知识分子很快就以历史的新方式，重演了五七年大鸣大放迅速失控的旧戏，这说明知识阶级本身是独立的阶级，它不可能是无产阶级掌中的玩物。事实证明，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确是在历史地顽强地表现本阶级的意志。为此有的文革评论家从反面评论文革，认为文革培养了大大小小的毛泽东式的野心家。其实这种评论的认识根源，是在于不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着独立的阶级本性。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是“野心家”，中国知识分子的老祖宗孔子的座右铭就是“修身治家平天下”，因为知识阶级的“野心”是知识阶级的阶级本性决定的。知识阶级本性原则上有三个特征：第一是注重知识注重理论的彻底性，显然这是因为知识阶级只能依靠控制知识要素才能保持自己在社会生产中的独立地位；第二是注重对其它两大阶级意志的折中调和的综合性，这也是知识阶级在生产中综合劳动和财产两个要素的天然的功能决定的；第三是知识阶级始终着眼于三大阶级共同发展的全局性，因为知识阶级的天职是将生产力三大要素拧成一股绳，从而去形成实际的社会生产力。如果人们能够去认真研究一下孔子和孙中山的人生，就会发现他们的主张和实践相当全面地反映了知识阶级的彻底性、综合性和全局性。

第三，关于文革的保守派问题。有的文革评论认为文革中高校里存在保守派，应该说保守派在文革初期在高校里的确存在过，但基本上是工作组自上而下地组织的，随着文革的发动，所有高校里早已不存在什么保守派，这是当年我写《四一四思潮必胜》这张大字报之前作过全面调查的。所以，我认为当年中国年青的知识分子原则上都是理解和拥护毛发动文革的，因此他们原则上都是无产阶级的造反派，虽然他们不可能象遇罗克那样用体制外思维去介入文革，但他们普遍认识到当时共产党的体制必须改革。显然，在共产党体制改革问题上如此之统一观点，无疑是知识分子自在的独立的阶级性的顽强表现。相反，在工人农民当中，即便在中央文革的高压下，根本不要求共产党的体制作任何改革的保守派自始至终是存在，而且实力还不小，这也是劳动阶级的阶级本性的顽强表现。

第四，关于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分裂出四一四派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的朋友宋永毅先生认为四一四派是十七年的得利派，所以四一四才有“河归旧道十七年”的政治主张。当然，宋的这种看法也不绝对错误，因为四一四派的精英们事实上也是用这种观点来迎合和团结大量的从极左派排斥出来的中间群众的。但是四一四派的实践证明，它的政治观点并没有停留在这种直观的层次上。近期宋先生来大陆收集文革资料，他离开广州前再度采访我，并又一次非常认真地问我，为什么我出身不好但还会去当四一四这样坚决的保守派？可见宋先生是一个学风严峻的执著于文革研究的学者。其实宋的问题和他书中对四一四的评论观点是一致的，因为在宋的文革思维当中只存在两个阶级的概念，而不存在第三个阶级**お**知识阶级的概念，因此他第一不可能认识到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必然要顽强地表现他们本阶级独立的阶级性，第二他也认识不到知识阶级的独立的阶级性的三个特征必然导致知识阶级的解放全人类思想。所以，知识阶级独立的阶级性决定了文革中必然会出现清华大学四一四派。这种派别的精英参加文革的理论目标是很深远的，他们顽强地保持着知识阶级祖先的那种“天下为公”的传统思想，所以他们在文革中公开反对依靠后台闹革命，从来不去结交任何权贵或准备后路，他们的原则地只关注文革的结局

是否对知识分子有利，是否真的象当时的官方舆论讲的那样为了解放全人类。如果文革的结局眼看得比文革前要差，那么在没有找到解决文革提出的政治问题的有效的办法之前，还不如停止文革，甚至将文革的推倒重来，这样至少在中国，狗崽子的数量不至于再一次恶性膨胀。事实上在文革中，主张“四一四思潮必胜”的红卫兵精英们，就是这样不自觉地站在这种知识分子独立的阶级立场上，大无畏地高高地举起了反极左的理论旗帜。顺便插一句，应该说社会三大阶级共同发展的规律，决定了追求世界大同是人类共同的理想，但是三大阶级的大同观是不同的：无产阶级的大同观，是打倒别的阶级和改造别的阶级的大同观；资产阶级的大同观，是自己首先占有财富而后对别的阶级进行恩施的大同观；而知识阶级的大同观是三大阶级自觉自愿地向共同的伟大目标和平演变的大同观。

第四，文革中知识分子原则上都在体制内进行思维和实践，这说明当时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还没有认识到本阶级在历史上的独立地位和作用，因此他们还只能沿用祖宗的老方法去表现自己。这种老方法就是通过为其它实力雄厚的阶级作嫁衣裳的办法去牟取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权。这种方法与知识阶级长期以来的经济地位是相适应的。比如，在知识经济社会到来之前，知识白领基本上还得依靠工资来维持生活，只有到真正的知识经济社会，知识分子才进变成为知识、财产、劳动三位一体的标准的现代知识阶级。同时，这种方法也是与知识阶级的本性和战略相适应的。知识阶级过去、现在乃至将来，原则上永远是反暴力主义者，知识阶级坚信人类社会最锐利和不可战胜的武器和战略，是依靠知识和理论占领人类的灵魂阵地，用和平演变的方法引导人类永远走共同发展的道路。因此如果说，文革中知识分子用左的方式为无产阶级作嫁衣裳的话，那么在六四中知识分子事实上是以右的方式为资产阶级作嫁衣裳。历史证明，一方面，无论是以左的方式为人作嫁衣裳，还是以右的方式为别人作嫁衣裳，知识分子作为独立的阶级是不可能完成自的历史使命的；另一方面，现代知识分子也只能在扬弃自己的左和右的失败和错误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独立地站起来。所以，文革和六四的失败的深远的历史意义，主要的是使现代知识阶级在历史的否定之否定的苦炼中，历史地认清自己独立的阶级地位和使命，从而逐步地在行动上真正联合成为自觉自为的阶级，最后依托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从容不迫地走上主导知识经济社会的历史舞台。

总而言之，国际共运和两极冷战是资本原始积累过急过猛的必然；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国际共运和两极冷战之必然；而中国改革开放和世界市场经济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必然会进入稳定发展时期之表现，也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现代知识阶级崛起之必然。所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国的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一系列历史性的失误，是社会发​​展规律在辩证地支持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进入正常稳定发展的轨道。所以，成功的一极自然应当从正面得到历史的肯定，但失败的一极因为它本身是成功一极的唯一的支点，也不应该对它简单化地否定。更重要的是，在世界两极冷战中，无论是成功一极还是失败的一极，都在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历史地培养和造就人类的大器晚成的最先进最伟大的现代知识阶级，从而为全世界全面展开资本主义稳定发展的大好局面创造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我们站现代知识阶级立场上，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有关的历史事件及其人物的总看法。

□ 作者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九日于广州

お お お お お お お お お お お お お お お お お お お お お お お お お お お お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illegible]

本期责任编辑: 华新民 (美国) <cnd-cm@cnd.org>

如需获取关于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gb, hz 或 gb-uu 编码版）以及 CND 提供的其它免费服务的详细步骤和有关信息，请致信〈[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ftp 服务站地址: ftp.cnd.org[207.151.78.100]: pub/hxwz  
canada.cnd.org[142.132.1.13]: pub/cnd/hx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